钱大昕与乾嘉考据史学

黄 爱 平

乾隆嘉庆年间，是清代学术发展的辉煌时期。自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学术大师力反明末空疏学风之弊，主张经世致用，提倡读书，强调证据，开启一代新的学风以来，经过一百余年的酝酿、发展，至乾嘉年间，以考据为特色的汉学风靡一时，学者以考证的方法从事研究，在扩大经学范围，带动其他学科发展的同时，也在史学领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乾嘉考据史学。流风所披，各种历史考证著作层见迭出，诸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梁玉绳《史记志疑》，钱大昭《汉书辨疑》、《三国志辨疑》，杭世骏《三国志补注》，梁章钜《三国志旁证》，沈钦韩《两汉书疏证》，陈景云《两汉订误》，洪亮吉《四史发伏》，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赵绍祖《通鉴注商》，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厉鹗《辽史拾遗》，汪辉祖《元史本证》，等等，其考证范围之广，学术水平之高，堪称是对中国历代史籍的一次全面清理和总结。而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当推钱大昕及其代表作《廿二史考异》。

一

钱大昕(1728－1804 年)，字晓征，一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晚号潜研老人，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县)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而后历官翰林院编修，侍读、侍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事，先后奉旨参加《热河志》、《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等书的纂修工作，又多次出任山东、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乾隆三十九年(1774)提督广东学政，次年夏，以父丧归里，从此不复出任，定居苏州，先后主讲钟山、娄东、紫阳书院，以讲学造士、研究著述终老。

钱大昕幼时聪颖，刻苦向学，被誉为“天下才”。成年后又与王鸣盛、褚寅亮、王昶、曹仁虎等人同“以古学相策厉”，并与汉学大师惠栋及吴派学者沈彤等人引为忘年交，相互研讨经义，在学术上深受惠栋影响。终其一生，无论供职翰林院，抑或休官归里，均一直从事学术活动，并以倡导经史之学，研究著述为己任。积数十年的功夫，钱大昕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治学主张，而且在当时的各个学术领域，特别是史学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作为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和史学家，钱大昕的治学主张，特别是他的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特色，对当时的学术界起了纠偏救弊、转移风气的作用。

其一、重视史学，主张经史并列。这是钱大昕有别于其它学者的突出之处。宋明以来，学者讲求心性，贬低史学，“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甚至认为“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造成“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的状况，[①] 为了纠正这种空疏学风，清初学术大师黄宗羲就曾提出穷经兼史的主张，认为“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②]钱大昕继承了黄宗羲这一主张，反对种种“陋史而荣经”的怪论，明确把史提高到与经并列的地位，说“经与史岂有二学哉“。[③]指出《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史记》、《汉书》“其文与六经并传而不愧”，批评当时“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

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④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经典是封建地主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所谓“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⑤因而治经被视为最高的学问，经书也成为读书人必读之书，钱大昕虽然没有直接贬低经的权威，但却大大提高了史的地位，并且身体力行，在自己的治学实践中越出儒家偏重治经的界限，以主要精力研治史学，开拓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在当时的学术界起到了转移风气的作用，直接推动了乾嘉史学的发展。

其二、强调实事求是。钱大昕师承惠栋，遵奉汉学家共同倡导的由文字、音韵、训诂入手究明经书义理的治学宗旨，明确主张：“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后儒不知训诂，欲以向壁虚造之说求义理所在，夫是以支离而失其宗。汉之经师，其训诂皆有家法，以其去圣人未远，魏晋而降，儒生好异求新，注解日多，而经日晦，”⑥因而“诂训必依汉儒，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义犹有存者，异于后人之不知而作也”。⑦钱大昕在尊崇汉学，师承惠栋的同时，又能不为其所囿，一反当时吴派学者普遍存在的“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佞古、墨守之弊，大倡“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⑧他说：“后儒之说胜于古，从其胜者，不必强从古可也。一儒之说而先后异，从其是焉者可也”。⑨并明确宣称：“以古为师，师其是而已矣。夫岂陋今荣古，异趣以相高哉。”⑩从这样的原则出发，钱大昕治学十分强调“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敢于驳正前人乃至时贤学术上的讹误之处。在他看来：“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且“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⑪特别是“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龂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⑫因此，钱大昕把主要精力倾注于对历代史籍“拾遗规过”、订误正讹的研究，在史学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其三、反对空谈，提倡训诂考证。从汉学家的宗旨出发，钱大昕十分反对理学末流空疏措大的学风，他说：“元明以来，学者空谈名理，不复从事训诂，制度象数，张口茫如”，⑬甚而“目记诵为俗生，诃多闻为丧志，其持论甚高，而实便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辈。有明三百年，学者往往蹈此失”。⑭他还批评理学家大搞支离破碎的语录，谓“释子之语录始于唐，儒家之语录始于宋，儒其行而释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辞气必远鄙倍，语录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词矣”。⑮钱大昕认为：“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诗书执礼皆经世之言也。《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论政者居其半，当时师弟子所讲求者，无非持身处世辞受取与之节。而性与天道，虽大贤犹不得而闻，儒者之务实用而不尚空谈如此。”⑯他反复强调：“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谈，似正实非正也。”⑰由经及史，钱大昕也极力反对史学中的空谈，认为作史贵在客观真实，大可不必仿效所谓春秋笔法，任意褒贬。他说：“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⑱据此，钱大昕对欧阳修《新唐书》、朱熹《通鉴纲目》两书一味仿效春秋笔法的做法深为不满，批评说：“欧公修《唐书》，于本纪亦循旧史之例，如李林甫书薨，田承嗣、李正己书卒，初无异辞，独于宰相表变文，有书薨、书卒、书死之别，欲以示善善恶恶之旨。然科条既殊，争端斯启。书死者固为巨奸，书薨者不皆忠谠。予夺之际，已无定论。紫阳《纲目》颇取欧公之法，而设例益繁，或去其官，或削其爵，或夺其谥，书法偶有不齐，后人复以己意揣之，而读史之家，几同于刑部之决狱矣”⑲。尤其可贵的是，钱大昕还认识到研究历史，从事历史考证，“必知其人而论其世”⑳，不可脱离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而一意苛求。他批

评有的人“不稽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明确表示自己“尤不敢效也”[21]。为了克服学术界存在的空疏之习，钱大昕治经强调由文字、音韵、训诂入手，治史则重视历史考证，以治经的方法治史，终于成为乾嘉时期最负盛名的学者和史学家。

二

钱大昕的学术成就，可以用“博大精深”四个字来加以概括。对此，当时及后世的学者已有定评。段玉裁说：“先生于儒者之艺，无弗习，无弗精”，“凡文字、音韵、训诂之精微，地理之沿革，历代官制之体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里居、官爵、事实、年齿之纷繁，古今石刻画篆隶可订六书，故实可裨史传者，以及古《九章算术》，自汉迄今中西历法，无不了如指掌”[22]。阮元也说：“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23]。而最能代表钱大昕学术成就及其治学特点的，首推史学。在其代表作《廿二史考异》及有关论著中，钱大昕运用经学、小学、天文、地理、典制、金石等方面的广博知识，对历代正史及其有关问题进行了精细的考订校勘和详实的爬梳整理。

钱大昕认为：“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曰舆地、曰官制、曰氏族”[24]，因而他对舆地之学十分重视，强调“读史而不谙舆地，譬犹瞽之无相也”[25]。为此，他毕生“留意方舆之学”，对历代史书的《地理志》作了大量的考订工作，纠正了许多记载舛误及传写讹脱之处。如《晋书·地理志》载：“(东晋)明帝以郗鉴为刺史，寄居广陵，置濮阳、济阴、高平，泰山等郡，后改为南兖州”。钱大昕认为，晋志此称“南兖州”不确，因“侨州加‘南’，昉于(南朝宋)永初诏书，晋世方镇未有称南兖、南徐者也”。[26]他考证说：“晋南渡后，侨置徐、兖、青诸州，俱不加‘南’字。刘裕灭南燕，收复青、徐故土，乃立北青、北徐州，而侨置之名如故。是时兖境亦收复，不别立北兖州，但以刺史治广陵，或治淮阴，而遥领淮北实郡。义熙末，乃以兖州刺史治滑台，而二兖始分。然侨立之州犹不称南。至永初受禅以后，始诏除北加南，沈休文《州郡志》谓晋成帝立南兖州，寄治京口时，又立南青州及并州，此特据后来之名追称之，非当时有南兖、南青之名也。此《志》乃谓成帝后改南兖州，则自郗鉴以后，领兖州刺史者，纪传一一可考，曷尝有称南兖者乎？盖唐初史臣误仞宋代追称为晋时本号，著之正史，沿讹者千有余年，至予始觉其谬，愿读史者共审之。”[27]又如《隋书·地理志》载：“黎阳县，后魏置黎阳郡，后置黎州。”钱大昕考订说：“《周书·武帝纪》宣政元年，分相州黎阳郡置黎州，则黎州乃周所置，魏世无此州也，当云后周置黎州，脱周字。”[28]这些考证，论据确凿，分析合理，无疑都很有说服力。

历代官制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也是钱大昕关注的问题。他花费极大的精力，对历代史书涉及职官、典制等方面的记载，作了细致的考释，发现和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如《宋史·宰辅表》记载：“三月庚辰，朱胜非自守中书侍郎，除通奉大夫、守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兼御营使。故事，命相进官三等，胜非特进五官”。此处乍看似无问题，但钱大昕经过仔细考订，仍发现其讹误之处。他说：“胜非任中书侍郎日，官已至太中大夫矣，由太中而上，则有通议、通奉、正议、正奉、宣奉五等。此云进五官，当是宣奉大夫，非通奉也。”[29]短短数语，既说明了宋代官制的有关情况，又纠正了史籍记载的讹误之处，充分显示了其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在考订历代正史有关官制及相应典制的基础上，钱大昕又进一步将历代官制上下贯穿，说明

其源流和变化，并集中阐释了历史上不同时期中央和地方官的称谓、职能、作用等问题。如大学士一官，始设于唐，其间及此后皆有所变化，钱大昕考证说："《唐书·百官志》:修文馆。景龙二年，始置大学士四人，以象四时；学士八人，以象八节；直学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时。此大学士设官之始。（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为大学士；李适、刘宪、崔湜、郑愔、卢藏用、李义、岑羲、刘子元，为学士；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为直学士；又引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等备员。见《文艺传》。）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皆宰相也。天宝二载，崇贤馆置大学士二人，以宰相为之。至德二年，置集贤院大学士。贞元四年，罢崇元馆、集贤院大学士。按《张说传》，始帝欲授说大学士，辞曰:学士本无大称，中宗崇宠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为称。说时为集贤院学士也。《李泌传》，加集贤院、崇文馆大学士。泌建言:学士加大，始中宗时，及张说为之，固辞。至崔圆复为大学士，亦引泌为让而止。此《泌传》之误。盖集贤之置大学士，始于崔圆，正在至德二载。而贞元四年，学士去'大'字，则由于泌之请耳。然自元和以后，宰相兼宏文馆、集贤殿大学士，率以为常，鲜有如张、李二公之能让者矣。宋初，昭文馆、集贤殿大学士，皆宰相领之，盖沿唐、五代之旧。其后置观文殿、资政殿大学士，虽不任事，亦以前宰执充，余官不得与焉。明代始专以殿阁大学士为宰辅之官，然秩止五品。国朝始升为正一品"[30]。这一考证，详晰揭示了大学士官职的源起及其演变。他如对三公、尚书、总督、巡抚、刺史等等，钱大昕也都作了详细的考释和说明，所论无不"援论精确，分析入微，为前人论史书中所罕见"[31]。

钱大昕对氏族问题也颇为留意。在他看来，"古人谱牒之学与国史相表里，《世本》一书，班《志》入之春秋家，后代志艺文者，以谱牒入史类，犹此意也。"[32]而研究历史，考证史书，尤需讲明谱系、氏族，否则，"触处皆成窒碍"。钱大昕举例说："自作史者不明此义，于是有一人而两传，若唐之杨朝晟，宋之程师孟，元之速不台、完者都、石抹也先、重喜者矣；有非其族而强合之，若《宋纪》以余晦为玠子者矣；有认昆弟为祖孙，若《元史》以李伯温为彀子者矣。至于耶律、移刺本一也，而或二之；回回、回鹘本二也，而或一之"，[33]造成了许多混乱。有鉴于此，钱大昕在《考异》一书中，对历史人物的姓字、世系、里居、官爵、年齿等作了大量考证，纠正了许多史书记载的讹误之处。如《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光武帝为"高祖九世之孙也"。钱大昕发现《后汉书》"纪、传所述世数，多不一例"。他考订说："此纪光武为高祖九世孙。自高祖至光武九世，实八世孙也。《皇后纪》伏后为大司徒湛八世孙，自湛至后八世，实七世孙也。至《刘永传》称梁孝王八世孙，自孝王至永父立，已八世矣。如依二纪之例，亦当云九世孙也。考班史诸表，自始封至子、孙、曾孙、玄孙、玄孙之子，即为六世，此以封爵之世次言，故合始封计之。他传则否。《孔光传》云孔子十四世孙，自孔子至光，实十五世。推此论之，当以永传为是。"[34]钱大昕不仅对正史中涉及历代人物的有关问题作了精审的考订，而且还在人物姓氏、年代的研究中作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如他为读史方便，曾选择古今有功经史的学者三百余人，分别考其生卒年寿，编成《疑年录》四卷。此例一开，便不断有人踵而继之，并加以发展，直至有近人梁廷灿的《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姜亮夫的《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陈垣的《释氏疑年录》等重要工具书，为查考历史上有关人物的生卒年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在重点考释地理、官制、氏族的同时，钱大昕还对历史上一些重要问题作了资料的爬梳整理以及专门的考订论述。如西汉年间，自汉高祖至成帝，为控制全国，稳定社会秩序，曾多次分封功臣、子弟为诸侯王，"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35]小者亦食一县、一乡、一亭。由于人数众多，辖地不一，"高祖之世，功臣侯者百五十余人，其封邑所在，班孟坚已不能言之；武、昭以后侯

者，班表始著其他，亦有不备者”。“《志》称侯国二百四十一，今数之，止百九十有四”，针对这里的矛盾，钱大昕详考《汉书》有关列传、志、表的记载，一一列举各侯国封邑所在，“各标其始封姓名，又补《志》之失注者二十五人”，[36]成《侯国考》一篇，为后人了解汉代诸侯情况所必读。又如九品中正法是魏晋时期朝廷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重要制度，“州郡皆设中正以品第人才，其任亦不轻矣。而中正之名，不见于史志”，后人难知其详。钱大昕也详考诸史，概括出此制的一般情况和荐举人才的具体方法：“盖每州置大中正一人，郡国皆有大中正一人，又以小中正贰之，其属则有清定、访问诸名，员数则未之详矣。《晋书・刘毅传》：年七十，告老，司徒举毅为青州大中正，尚书以毅县车致仕，不宜劳以碎务。陈留相乐安孙尹言：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则清谈倒错。于是青州自二品以上光禄勋石鉴等共奏曰，前被司徒符，当参举州大中正。佥以毅行高义明，出处同揆，实臣州人士所思准系。臣等虚劣，虽言废于前，今承尹书，敢不列启。由是毅遂为州都。然则州大中正缺，许本州二品以上参举，上之司徒，司徒以闻于朝，有不当者，尚书得驳之矣。又知致仕官亦可为中正也。《文献通考》云：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处人在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充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行义亏缺，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则县亦有中正也”[37]。这一考订翔实可据，至今仍是人们研究魏晋选举制度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

在对诸史的研究中，钱大昕用力最深的是元史。“《元史》纂修，始于明洪武二年，以二月丙寅开局，八月癸酉告成，计一百八十八日。其后续修顺帝一朝，于洪武三年二月乙丑再开局，七月丁未书成，计一百四十三日。综前后仅三百三十一日，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如“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太祖诸弟，止传其一，诸子亦传其一；太宗以后，皇子无一人立传者；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宰相表或有姓无名，诸王表或有封号无人名”，[38]等等。纰缪漏略之处，不胜枚举。有鉴于此，钱大昕用很大的精力从事元史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其一，发掘元代历史文献。元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有关文献史料流传甚少，明清以来，文人学子对此亦多有忽略。钱大昕则十分注意访求元代文献史料，发掘不遗余力。如《元秘史》记载元朝先世太祖、太宗两朝事迹，是研究元史和蒙古史的重要资料。但明初从蒙文译出后，一直深藏禁中，“世所罕睹”。直至明清之际孙承泽“偶从故家见之”，才录入其《元朝典故编年考》中，但仍未引起学者的注意。《四库全书总目》在著录孙书时，虽然从中发现此书，也略有所考，但却认为该书“所记大都琐屑细事，且间涉荒诞，盖亦传闻之辞，辗转失真，未足尽以为据”，[39]因而未予专门著录。钱大昕则凭藉他对元代历史的湛深研究，肯定此书“叙次颇得其实”，并称“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者，其必于此书折其衷”。[40]又如《元典章》一书，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门，胪载元世祖即位至英宗年间有关典制、掌故，尽管该书“于当年法令，分门胪载，采掇颇详”，可“备一朝之故事”，但却未得到学者重视，流传渐稀，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也因其“所载皆案牍之文，兼杂方言俗语，浮词妨要者十之七八。又体例瞀乱，漫无端绪，……不足以资考证”。[41] 而摒之于存目。钱大昕不辞辛苦，访求十年，才从友人处得到家藏抄本，自谓“如获百朋”。[42]他如《元圣武亲征录》、《长春真人西

游记》等书，也是经钱大昕发掘、阐扬，才得以流传开来，与《元秘史》、《元典章》一道，成为至今研究元史和蒙古史必不可少的基本史籍。

其二、考订《元史》讹误。由于《元史》一书存在着诸多疏误讹舛之处，因而钱大昕对《元史》作了颇为细致的考订和补遗，在囊括二十三种史书，共计一百卷的《考异》中，《元史》部分便占了十五卷篇幅，仅次于《唐书》和《宋史》，可见其用功之深。在这些考订中，钱大昕利用《元秘史》这类有关蒙古史和元史的重要史料，参以《金史》、《宋史》等书，以及石刻碑碣之文，又根据《元史》本纪、列传互相印证，纠正了《元史》不少讹误之处，同时也补充说明了《元史》疏漏的一些问题。如《元史·太祖本纪》载："史天倪、萧勃迭率众来降，木华黎承制，并以为万户"。《史天倪传》说："以万户统诸降卒"。《石抹勃迭儿(即萧勃迭)传》则称"擢为千户"。三处记载不尽一致。究竟何者为是？钱大昕考证说："元初，万户为军官最要之职，太祖时，惟木华黎、博尔术为左右万户，纳牙为中军万户，此外虽蒙古世臣，亦不轻授。天倪辈汉人初附，岂得便居此职，则《石抹传》云擢千户者，似为近之"。钱大昕还进一步探究了史臣致误的原因，他说："考张匡衍撰《木华黎行录》云，史天倪、萧勃迭率众来降，王奏各统万户。其云各统万户者，谓令其领万人从征耳，非授以万户之职也。史臣昧于官制，遂以为真授万户矣"。[43]又如《元史·宗室世系表》因"元之宗系，藏之金匮石室者甚秘，外廷莫能知也，其在史官，固特其概，而考诸简牍，又未必尽得其详"[44]故所载元初世系，颇为漏略，就连元之先世"脱奔咩哩犍、阿兰果火"，亦仅载其名，而渊源世系不甚了了. 钱大昕则据《元秘史》补充说："蒙古之始祖曰巴塔赤罕，生子曰塔马察，塔马察子曰豁里差儿蔑儿干，豁里差儿蔑儿干子曰阿兀站索罗温，阿兀站索罗温子曰撒里合察兀，撒里合察兀子曰也客你敦，也客你敦子曰挦锁赤，挦锁赤子曰合儿出，合儿出子曰孛儿只吉歹蔑儿干，孛儿只吉歹蔑儿干子曰脱罗豁勒真伯颜，脱罗豁勒真子曰朵奔蔑儿干，即脱奔咩哩犍也。自巴塔赤罕至朵奔蔑儿干，凡十一世。阿兰果火，《秘史》作阿兰豁阿，姓豁里剌儿氏。"[45]诸如此类的考订，源源本本，有根有据，既纠正了《元史》讹误之处，又补充了《元史》漏略的有关问题，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廓清了道路。

其三、进行专题研究。乾嘉时期，元史之所以不受学者重视，与其研究本身的难度也不无关系。本来治史就因人物众多，史事纷繁，文献难征，使一些文人学士望而却步，而元代又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其特有的语言、制度难以理解，人名、地名亦佶倔难记，所以更乏人问津。钱大昕以卓越的学术勇气，致力于元史研究，解决了诸多疑难问题。如元代蒙古人、色目人的姓氏，是研究元史的一大难题，这是因为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朝廷官吏多由蒙古人、色目人及其功臣世家子弟充任，他们虽属不同氏族，但历来"名与姓不相属，公私称谓有名无氏"，造成史籍中人物同名者甚多的状况。"非以氏族晰之，读者茫乎莫辩"。[46]因而，钱大昕广采正史、杂史有关记载，兼及文集、题名录、碑刻等各种史料，费时数十年，撰成《元史氏族表》，凡蒙古、色目人等有族姓可考者，皆顺序胪列，同一族姓之下，则每支按世系分列成表，使得头绪纷繁的元代人物姓氏，历历在目，厘然可考。又如《元史》无《艺文志》，欲考一代著述，文献无征。明清以来，陆续有学者留意元代著述，或补作《艺文志》、如明焦竑的《国史经籍志》、清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朱彝尊的《经义考》、倪灿的《补辽金元艺文志》等。钱大昕总结前人成果，校正诸家疏误，进一步广搜博采，撰《补元史艺文志》一书，收集著录元人著述数百种，成为较为完备的补志之作。

其四、重撰《元史》。钱大昕"生平于元史用功最深"，[47]自述其还在朝廷任职时，即"留心旧典，以洪武所葺《元史》，冗杂漏落，潦草尤甚，拟仿范蔚宗、欧阳永叔之例，别为编次，更定目

录，或删或补，次第属草，未及就绪。归田以后，此事遂废，唯世系表、艺文志二稿，尚留箧中”。[46]其弟子黄钟亦称，“先生尝欲别为编次，以成一代信史，稿已数易，而尚未卒业，其艺文志及此表（《元史氏族表》）皆旧史所未备，先生特创补之。”[48]可见，钱大昕从事元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欲仿范晔撰《后汉书》、欧阳修重编《唐书》之例，重修一部《元史》，并且“稿已数易”，所成《元史氏族表》、《补元史艺文志》，即为其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但《潜研堂全书》所列“已刻未刻书目”，都未提到《元史稿》。直到清末民初，郑文焯的《国朝未刊遗书目》才著录有钱大昕《元史稿》一百卷。日本人岛田翰著《古文旧书考》后附《江南访书余录》也说，曾见到钱大昕手写《元史稿》残本二十八册，缺卷首至二十五。自此而后，则再没有人言及。钱大昕《元史稿》一书未能面世，无疑是件憾事，但他致力于元代历史文献的发掘、表彰，对《元史》一书作了大量精审的考证，对元代历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从而开启了后世元史研究的风气，造就了一批有志于斯的学者，其筚路蓝缕之功，实不可磨灭。

四

在清代中叶的学术界，钱大昕以其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特别是以其在史学领域的卓越贡献，成为乾嘉考据史学乃至清代汉学的杰出代表。其学术主张和治学途径，也集中反映了一代学术的基本特征。

首先，钱大昕治学主张“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反对师心自用，摒弃门户之见，力求“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他毕生致力于史书的订讹辨误，释疑解难，以恢复历史真实，为后世留下信史。这种求真求实的思想主张与学术实践，集中体现了乾嘉史学乃至清代汉学实事求是的精神。钱大昕之所以能在史学及其他学术领域取得杰出的成就，清代汉学之所以能达到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发展的高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主张，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王引之说：“国初，诸儒起而振之，若昆山顾氏、宣城梅氏、太原阎氏、婺源江氏、元和惠氏，其学皆实事求是，先生（钱大昕）出于其后而集其成焉”[50]。可以说比较准确地概括了自顾炎武开创，历梅文鼎、阎若璩、江永、惠栋始形成，至钱大昕而发扬光大的清代汉学的特点。

其次，钱大昕治学十分强调考据，反对议论。这也是乾嘉史学乃至清代汉学的最大特色。与宋明理学长于议论思辨，“六经皆我注脚”的学术路径相反，清代汉学注重考据，强调“我注六经”，学者普遍重视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试图以此入手，来究明经书的真正涵义。由经及史，学者大多沿用治经的方法治史，从而形成以考据为主流的乾嘉史学。而钱大昕重视史学，强调考据的主张，在乾嘉史学形成并发煌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勿庸置疑，钱大昕治史主张考据，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历史学本身是以已逝的人类过去的客观存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人们要了解人类社会的过去和遥远的历史，只能凭藉史料。但由于种种因素，史料与其所记载的社会历史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很难绝对准确、客观地反映史实。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史料的亡佚、讹错等时有发生，又进一步加剧了史料与史实之间的矛盾。因此，要客观地把握人类社会的过去，要研究遥远的历史，历史学家就必须首先搜集、整理、考证、剖析史料，考证史学正是由此产生，并成为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面临宋明以来理学末流空疏学风给史学领域造成的混乱状况，清代史学家起而澄清史实，还史书以原貌的任务就显得更为必要和更加迫切，这也正是乾嘉考据史学得以勃兴的内在逻辑因素。但是，钱大昕全盘否定议论，又是不足取的。历史学不仅要客观地记述、反映历史事实，还应当对历史作出因果解释，

并进而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完整的历史学既有考据史学的成份，也包括分析史学的内容，并且往往二者并存，相互包容，相互促进。而以考据为主流的乾嘉史学，恰恰是推重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就此而言，钱大昕治史强调考据，否定议论的主张，也正是乾嘉史学本身所具有的进步性和局限性的反映。

再次，钱大昕在长期的治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严谨的研究方法。他不迷信古书陈说，在浩瀚的史书中稽古钩沉，积累了大量的材料，然后加以归类排比，用以校勘史籍，印证史事，力求做到言必有据，孤证不立。这实际上是形式逻辑的归纳法和类比法。其特点在于注重证据，列举大量同类现象，或在归纳过程中找到共同之点，得出结论；或在比较研究中发现差异，找出问题。由于其研究建立在充分而扎实的史料依据的基础之上，所以其结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研究成果也就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无疑，这也是钱大昕及其他乾嘉史学家能够取得杰出成就的原因之一。当然，这种方法本身有其局限性，如只看到局部的和个别的事物，看不到全面的、整体的事物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表现在他们的研究中，就是只能解决史事或史籍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而无法反映历史的全貌及其发展进程。但是，在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的规律尚未发现之时，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必然占据主导地位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进步意义。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史学家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能够把传统的研究方法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接近或达到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成就和贡献。

---

①③⑰赵翼《廿二史札记》卷首，钱大昕《序》。

②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州先生神道碑文》。

④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

⑤《隋书·经籍志》。

⑥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左氏传古注辑存序》。

⑦⑩《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

⑧《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卢氏群书拾补序》。

⑨《潜研堂文集》卷九，《答问六》。

⑪《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五，《答王西庄书》。

⑫㉑《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廿二史考异序》。

⑬《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重刻孙明复小集序》。

⑭《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三，《与晦之论尔雅书》。

⑮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语录》。

⑯《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世纬序》。

⑱《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唐书直笔新例》。

⑲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四十六。

⑳《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郑康成年谱序》。

㉒㊼《潜研堂文集序》。

㉓《十驾斋养新录序》。

㉔㉝《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廿四史同姓名录序》。

㉕㉖《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序》。

㉗《廿二史考异》卷十九。

㉘《廿二史考异》卷三十三。

㉙《廿二史考异》卷七十四。
㉚《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大学士》。
㉛金毓黻《中国史学史》。
㉜《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吴兴闵氏家乘序》。
㉞《廿二史考异》卷十。
㉟《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序》。
㊱《廿二史考异》卷九。
㊲《潜研堂文集》卷十二，《答问九》。
㊳《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元史》。
㊴《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一，《元朝典故编年考》。
㊵《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八，《跋元秘史》。
㊶《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三，《元典章》。
㊷《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八，《跋元圣政典章》。
㊸《廿二史考异》卷八十六。
㊹《元史》卷一百零七。
㊺《廿二史考异》卷九十一。
㊻㊾黄钟《元史氏族表序》。
㊽《补元史艺文志自序》。
㊿《王文简集》卷四，《詹事府少詹事钱先生神道碑铭》。